

〈第二十六辑〉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舒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南昌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徐廷敏

江西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赣字八〇年第五五号批准出版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7.2印张 字数15万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

定价：1.00元



庐山「五百罗汉图」中「寿纪无量」一轴（王宪章提供）

目 录

怀念游国恩先生·····	金开诚(1)
一个教育改革者——陈剑脩·····	吴自强(7)
江西的孟尝君——陈茵舟·····	陈文耀(11)
庐山《五百罗汉图》及其历险记·····	王宪章(17)
一所北洋军阀的贵族学校·····	林涤非(23)
南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蔡智传(26)
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先行者——黎荣光牧师·····	满 先(39)
我所知道的东南青年夏令营·····	张国盛(41)
俞应麓与常玉广汽车股份公司·····	邹 崛(47)
抗日期间的国民党中央军校三分校·····	陈子鸣(54)
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三分校第十六期政治总队的 日子里·····	范长琛(62)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情况忆述·····	周善琦 张国盛(78)
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亲历记·····	王道生(84)
宪兵第十五团杂忆·····	毛炳岳(93)
东南分团片断回忆·····	庞佑琳(101)
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内幕·····	徐建中(104)
营救苏联飞行员的前前后后·····	陆新亚 俞西远(119)

我所经历的“八一三”淞沪抗战·····	滕振梁(125)
入缅作战见闻·····	乐学刚(128)
我所知道的文群·····	文大炳(133)
桂永清其人其事·····	吴幼元(138)
胡靖安的浮沉录·····	张盛吉(152)
蒋经国在赣州禁烟·····	徐浩然 吴识沧(159)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内幕·····	徐浩然 吴识沧(165)
“新赣南”出版社和“新赣南”书店历史片断·····	钦 人(171)
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始末·····	梅绍裘(173)

怀念游国恩先生

金开诚

敬爱的游国恩先生去世已经九年了。他生前有许多事情在我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又因为至今我还在断断续续做他遗留下来的工作，更不能不常常想念他。想起他那和蔼的仪容和可敬的言行，我总是深感悲痛，也时有感奋。只是限于自己的认识水平，不能对他的思想和学术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表述；只能零零碎碎记下一些直观的印象，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我从1959年冬开始协助游先生编撰《楚辞注疏长编》，以后五年多，大部分时间在他家里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有一年多经常和他在一起。作为他的学生，我对他的思想和学术都学得很差，但工作事务上的联系都是紧密的。在这么多年推心置腹的相处中，我从来没有见他说过一句不合原则的话，做过一件有亏德行的事。现在事隔多年，我回忆当时的情形，想见他那表里如一，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品格与风范，便再也不能抑制心潮的激动。

游先生作为一级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不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很受人们尊重。他深知一切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所以在“文化革命”以前的这么多年中，他总是积极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兢兢业业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遇有较为重要的问题，也从来不忘向组织上请示汇报。平常来同他谈工作的基层干部都是他的学生，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同志是来向他商量工作或向他征求意见，而游先生对他们都很尊重，并且总能自觉考虑工作的需要，积极承担

金开诚，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各种任务。游先生所以能这样，完全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坚信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游先生是一个内在性格非常耿介的人，决不肯做任何违反本心，不符合自己的认识和觉悟的事。正因为如此，他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就坚决闭门读书，绝不苟合求容。

这一时期，我是在1971年从干校回来后才同他有联系，接触也不象过去那样多。但从他偶然流露的片言只语中，我还是可以清楚地感知他内心深处的活动。例如在“评法批儒”中，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法家要都象王安石就好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不图私利的！”又说：“一个人不管嘴上说什么，他的动机别人也总能看见。”这些话显然表现了他对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四人帮”的强烈反感。在评论《水浒》的时候，系里动员他写文章，他写了一篇短文给我看，说：“批评宋江我还跟得上，别的我就不会说了，这篇文章写了也是白写。”十年动乱的后期，游先生由于年老体弱，越来越为长期停工的《楚辞长编》感到着急，一再说希望至少能活着看到第一册《离骚纂义》编成，但是这一愿望都得不到任何支持。他曾对我愤愤地说：“《楚辞长编》害着谁了？它是无害类么。我想不通这么大的中国为什么容它不下？！”当然，这时他更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虽然不出门，却总向来访的熟人详细了解学校和社会上的情况；同他交谈可以明显地感到他渴望险恶的形势能早日发生变化。“四人帮”被揭发后，游先生极其兴奋。一谈起这个问题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说又说了，诗也是写了又写，共有八首之多。就在那些天里，他叫我赶快把《楚辞长编》的资料集中起来，准备开始工作，他还乐呵呵地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幸亏没干，要是他们把这列入‘战斗任务’，那就糟了。”把游先生“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联系起来看，在他身上显然表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对党的忠诚和坚贞的节操。

游先生一贯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解放不久，他就参加了当时华

北革大所举办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后来他坚持认真学习经典著作。在盛行“讲用”的时候，他曾经对我说：“马列主义我学得不好，又最不会谈体会，但我的确感到学不学马列是不一样的。”有一次他找出一堆国外研究《楚辞》的资料让我看，我翻了几篇，感到这些论文根本没有论点。游先生就说：“他们的东西就是这样，过去我们没学马列，搞起来也和他们差不多，现在看不成了。”1963年他要去日本讲学，让我根据他的指示起草两篇报告。他定的题目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我说到日本去讲是不是该有一篇考据文章，他立即答道：“不要考据，这两个题目更能反映我们解放以后的学术特点。”按照我的理解，这话是清楚反映了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新中国的学术感到自豪的心情。

游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这是学术界共知的，在这方面我限于学力，不足以窥其涯际。所以只能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等问题上重温一下他对我的种种教导。游先生强调做学问“要走平正通达的大道”。他对这句话反复作过很多解释。概括起来说，一是要着眼于比较有意义的问题，不要在冷僻琐碎的事情上纠缠不休；二是通过艰苦细致地学习而“功到自然成”，“不要走捷径”以求少劳多得；三是进行推理和作出结论都要“合情合理”，“不要挖空心思，标奇立异”。他说：“平正通达做学问，错了也不至于荒唐可笑，贻害后人。”联系到古代的《楚辞》注释来说，他认为洪兴祖、朱熹、钱澄之、蒋驥、戴震都是走大路的；而象朱翼、王闳运那样就是走小路；走小路或许能哗众取宠于一时，但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在学术研究中，游先生特别强调全面掌握材料的重要性，他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什么历劫不磨？就因为史料基础非常扎实。《通鉴》也是做长编，然后撰为通史的。不全面总结前人的成果就谈不上创新；不集中充足的资料，虽有识力也无从发挥。在审阅《长编》资料卡片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深有感慨地说：“简简单单两句原文，谁能想到竟会有这么多的解释，你要不把前人的说

法综合到一起，那就根本无法想象出这么多解释来。可见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假如不多读书就去发表意见，岂不太危险了？”他又说：“我们在《长编》按语中不能不指出前人一些错处，有些错处还显得可笑，但我们自己如果轻于下结论，那么后人也会显得我们是可笑的。”为了使《长编》收集资料较为齐全，游先生不知操了多少心；但有些书终于无法见到，这始终是游先生的一桩心事，也常常在嘴里念叨，直到全部资料转入统一编排时，他还殷殷嘱咐我，将来如有机会，一定要将所缺的书补上。

在成果与名望的关系上，游先生说 he 坚信“实至名归”，说“这是不会亏待人的”。他强调做学问最忌追名逐利，认为种种弊病都由此而起。他还精辟地指出：“出一部书固然不容易，可是出去之后如果自己觉得惭愧，想要毁掉它，那却由不得你；所以著述一定要慎重，要使它长久对人们有利，成为‘寿世之作’。”在这个问题上，游先生充分表明他是言行一致的。60年代初期，有的出版单位就曾一再劝游先生将他早年编成的《离骚》、《天问》两部长编的油印稿提前付印，等补充修改完毕之后，可以再出版。游先生都婉言谢绝了。他对我说：“这种做法怎么能行？一部书要编得毫无欠缺当然不可能，但总要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之后才能让它出版，这才心里踏实，也对得起读者。”在他晚年，虽然曾为《长编》的成书而焦急，可做起来仍然一丝不苟；哪怕在因病住院期间，也是一页一页地细阅卡片，慎重地决定去取，并逐条考虑哪些按语需要修改。想到他终于未能看到《长编》的出版，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但他在这项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严谨慎重，极端认真的态度和作风，却实在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游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对人的培养。在教学方面，他自己统计前后共讲过二十多门课，在讲课中他最注意内容是否充实，条理是否清楚。他说：“一门课有一门课的要求，现在有些人讲课时，对自己熟悉的东西讲得很多，占了很多时间；到了不熟悉的部分就借口时间不够了，一带而过。还有的人在课堂上想到什

么说什么，杂乱无章，这都是不利于培养人的。”游先生的课不但内容过硬，而且在讲授和辅导中都循循善诱，所以总能收到显著的效果，使学生深受教益。同时他对登门求教或写信请问的人，也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总是认真负责地帮人解决问题。在教学中，他的思想品德、态度作风也处处起着身教的作用。凡是受过他教育的人对这一点都深有感受。50年代中期有一个外校教师到北大进修，同游先生见过几次就极为诚恳地说：“原先只是想来向游老学习业务，现在感到首先要学他的为人。”

游先生多次明确声称他是愿意带徒弟的。他说：“别人让我找点资料，查个出处，这种事我是不用准备的。可是突然向我提出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平常又不在想它，这就难以当场给人真正的帮助。至于徒弟就不同了，他跟着我讲课，跟着我搞科研，他所遇到的疑难也就是我正在考虑或已经解决的问题，彼此就可以深入切磋，长期这样干，大家都有好处。”他还说：“带徒弟是个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培养人的方法，有人说这是手工业的作法，看不起它；可是手工业都有精雕细琢的特点，所以带徒弟这种方式还是应该有的。”在《楚辞长编》的编撰中，游先生始终是想要既出成果又出人的。早在1959年，他就把这个自己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项目拿出来，在他指导下，由当时中文系一些教员和毕业班十名同学来搞集体科研。但因为那一次只搞了两星期，所以在培养人的方面效果还不显著。后来中文系又有好几个教员曾先后参加这项工作，中华书局也聘请了两位同志来协作，游先生对所有这些人都来者不拒，一视同仁。他还一再嘱咐我，对中华书局的两位同志多多关照，工作上不要催得太急，让他们在《楚辞》之外还有时间搞些别的东西。1977年，《长编》工作重新开始以后，我向游先生提出，让古典文献专业新留校的董洪利、高路明同志来参加工作，游先生当即表示同意。还对我说：“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把《楚辞长编》看作私有的，只要专业同意，他们自己也愿意，尽管来好了。”接着他又详细向我了解这两个年青人的情况，当他听说高路明同志刚刚

毕业就要准备讲目录学课时，连说：“好，好，目录学赶紧要有人搞。”还说：“让她到我这里来，我要给她讲一课，指点指点门径。”不久我把高路明同志领到游先生家里。游先生那时身体已经比较衰弱了，但还是从下午三点多一直讲到近六点，嗓子都完全哑了；在我们一再劝阻下，才告一段落。这一幕幕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始终激励我要更多地关心年青人。虽然我没有力量象游先生那样给年青人以巨大的帮助，但至少要学习和继承他重视培养人的精神，把自己的所有课程和科研项目向年青人敞开，让他们和我一起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在九三学社的几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表示关心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所谓“《楚辞》梯队”。我对这个名称感到非常惭愧和不安。事实是游先生一贯重视培养人的正确而无私的思想决定了董洪利、高路明同志和我在一起工作；而在游先生去世以后，我们这些人根本是没有什么功力的散兵游勇。称为“梯队”是名实不符的。我们只能边学边干，遵照游先生的遗愿，把《楚辞注疏长编》的工作锲而不舍地继续下去。

（原载《临川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个教育改革者——陈剑脩

吴 自 强

陈剑脩先生原名宝镠，江西遂川县人，其父名陈老杰，生有四子，长男即先生，其他三子均以经商为业，而陈先生自己则一贯在外从事教育工作。

1932年3月，我从日本留学归国，任职于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当时他是新任教育厅长，而省民教馆馆长是省督学欧阳魁先生兼任，他有时外出视察教育，馆务由我代理，因此，我得有机会去教育厅与陈先生接洽公务，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易近人，待人热情，他是以学者风度担任教育行政工作的，毫无官僚习气。值得景仰。1950年我来福建师范学院任教，只通过一次信，但和他的高足谭永年曾在江西“八一”革大研究部同学，又与他当年在教育厅同事王倘、罗廷光（炳之）等教授及广西大学教育系教师梁精华（遂川人）等，经常有书信来往，从他们口中，了解到陈先生生前的一些嘉言懿行，简叙如下：

一、少负才华 学业有成

陈先生青年时期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擅长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经常发表文章，深得当时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赏识，有时还为蔡先生撰稿、写文章，迨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专攻实验心理

吴自强，解放前在江西教育界工作多年。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学，颇有成就。1924年学成归国，回国前，武昌高师教育系延聘他任教心理学，由于北大是他的母校，又与蔡校长有师生关系，乃改就北大心理学系教席。蔡校长很钟爱他，甚至想把自己在法国留学的女儿许配他。蔡先生女儿学成归国时，特嘱剑脩先生去上海迎接，未审何故，未曾接到。后来蔡校长又转介绍其外甥女与之结婚。还有更值得一提的，陈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北大与罗家伦（南昌人，已去台湾）同负盛名，充任学生代表，掀起爱国运动，与周恩来总理开始有接触，成为“五四”青年学生中的闯将。

二、公正廉明 用人唯贤

陈先生解放前历任北大、南京中央大及浙大教育系等教授，三十年代开始任江西教育厅长，为时短暂，辞职后改任广西大学校长，陈先生在此期间，表现出公正廉明，用人唯贤的工作作风。例如，1932年在江西任教育厅长时，厅内高级人员如秘书、科长都是教育专家的英、美各国留学生，既有教育理论修养，又有教育实践经验，在他任内发表的各级学校校长，一般都是德才兼备，在省内外比较有声誉的人物，不曾植党营私，特别是原一中校长陈某，本来是陈先生在北大先后同学，而接任伊始，首先撤换他，这是前面任何教育厅长难以做到的。后来离开江西，改任广西大学校长时，据说其妻滥用职权，任用亲属担任事务行政工作，发生贪污事情，陈先生察觉后，比即严肃处理。每年招考新生时，阅卷、评分、录取等一系列工作，都亲自参加，如果发现个别学生，被错评分数，未被录取，考生申请复查，陈先生立即允诺，只要确有差错，立即改正。还有，陈先生一贯平等待人，比如对留校任助教的学生，从不直呼姓名，总是称呼“某某老师”，有时对教师提职评薪，也总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公平处理，从不凭亲疏恩怨，一个人说了算，象这种高尚风格，在旧社会里是不可多得的。

三、勇于改革 敢于更新

已如上述，陈先生在江西任教育厅长，为时虽短暂，但做了人所不敢做的好事。这里提出两件事：

（一）前面提到，1932年秋，他为了想改变江西教育界一派独霸的局面，首先就大义灭亲，更换北大出身的原一中校长，改委派北师大教授曾仲鲁（金溪人）继任，这件事在江西近代教育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自后江西教育界维持了均衡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为止，这不能不归功于陈先生勇于改革，敢于更新的魄力。可惜当时一中新任曾校长发表后，陈先生因事短时间离开了南昌，一中部分师生组织护校会，致使曾校长一个多月不能入校视事，当时省府熊式辉主席误认为陈先生逃避责任，不予支持，陈先生乃愤然辞职，陈先生这种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风格，也是一般旧官吏所难以做到的。陈先生辞职后，由熊式辉兼代厅长，一中护校会被迫解散，曾校长才得入校筹备开学招生，时间已延迟到10月初了。后来陈先生改任广西大学校长时，也受到地方反动势力的排挤，陈先生总是理直气壮地坚持斗争，一直继续任职到解放前夕为止。

（二）陈剑脩先生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时，1932年1月，南昌市政府因经费支绌，市立小学38所停办，全部移交江西省教育厅接办。陈先生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做了二件卓著成效的好事：1、创设江西省会小学区管理委员会，将督学改为视导员，设三人。经常在校，帮助校长做好行政工作，并辅导教师课堂教学。改进教学工作以及学生课外活动。各校有要求，不用公文，改用便条或口头报告。一改过去繁杂拖拉手续。要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订工作计划，有步骤分月进行。计划分行政计划、教导计划、总务计划。管理委员会也有视导计划，三个视导员分期轮流担任高、中、初年级辅导。举行公开教学，由任课教师订好课时计划，教学完毕，举行评议会。学生课桌，前低后高安排，学生从矮到高排列座次。左右两

边学生，每月掉换一次，以保视力。视导员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听后提意见。教师“抓中间，带两头”。不使学生成绩，相差悬殊太大。2、省教育厅设立健康教育推行委员会。派医生对学生身体检查，逐个治疗，并进行学生家访，查出原因。沙眼是全家共用毛巾传染，癞痢头是剃头担上剃刀传染，蛔虫是吃生菱角传染。立即加以宣传并采取措施防止。学期结束，癞痢头全部治愈，蛔虫被药打掉，沙眼轻则痊愈，重则减轻，及至全愈。学生康复，家长高兴。后省会小学全部转回市政府接办，便没有萧规曹随了。（注）

四、弃暗投明 晚节弥香

从以上看来，陈剑脩先生从青年时期起，就是一位热爱祖国，敢于和旧势力作斗争的典范人物，他的思想深处，早就倾向于中国共产党。1949年离开广西大学时，国民党有关负责人任命他为考试院考试委员，陈先生愤就不就职，奔赴香港，与张难先等联名义，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由香港赴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与欢迎，被任命为中南教育部副部长，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上是陈剑脩先生解放前后对我国教育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一些事迹。虽一鳞半爪，但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可惜建国后，陈先生在任中南教育部副部长期间，由于工作繁忙，身体衰弱，不幸于1953年病逝，终年57岁，这是我国教育界一个大损失。陈先生一生操持严谨，光明磊落，无论在新旧社会里，都是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始终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正义风格，我们要学习他一生赤胆忠心为人民教育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把我国建成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注：关于改革小学教育资料，是李昌元同志提供的。——编者

江西的孟尝君——陈菡舟

陈文藻

先父菡舟生于光绪十九年农历癸巳八月十六（即1893年9月25日），因患脑溢血于农历丁酉年六月廿二（即1957年7月19日）病故于南昌市法国医院（即今第三医院）。

他系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一生弃军经商，在南昌市创办了捷安轮船公司及真真照相馆。

他酷爱京剧，于1929年邀集朱月斋、林敬平、李二华、廖大可、彭克夷、罗时彬、熊梦甫等人成立了《己巳票房》。

他不嫌贫爱富，待人一视同仁，乐于助人。对戏剧工作者，无论是什么人遇到困难时，他都能竭尽全力，予以帮助，当时有人称他为“江西的孟尝君”。

兹举几例：

在胡云龙负责德胜舞台（设于南昌中正路，就是现在的胜利路，该舞台在现在的南昌市人民政府斜对面）时，有一次胡从广东请来粤剧团在该台演出，前几天可说是车水马龙，而后三天就门可罗雀，不但剧团发不出包银（现在叫“工资”），就连回广东的盘川也成问题。因而求胡帮忙，孰料胡不讲理，他竟怒斥粤剧团负责人说：“我们所订合同是三七分账，既卖不出票，哪来钱给你们做路费，你们讨饭回去，我也管不了！”当时有好心人劝该团负责人来找先父，先父二话没说，给他们想了个办法：首先免费乘我家的轮船“旅泰”（当时我家有轮船“旅丰”、“旅颐”、“旅泰”、“旅安”等）到赣州，然后按剧团人数发给由赣州至韶关的汽车票。而且先父还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结果，该团负责人千恩万